

明清两淮盐场“移亭就卤”与淮盐兴衰研究^{*}

鲍俊林

内容提要:因海势东迁,明清两淮盐场不断有“移亭就卤”,成为淮盐发展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别于其他海盐产区的典型特征。表面上看,海岸东迁不利于淮盐生产,但淮盐正是通过“移亭就卤”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苏北海岸带环境变化,迎来长期繁盛发展。这种独特的盐作生态,存在了数百年。海涂淤进,草卤分离,煎盐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的特点决定了筑置亭场的方式与过程。“移亭就卤”是盐作生产对荡草、土卤、咸潮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条件的适应,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经济状况。清末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移亭就卤”的积极性,亭场移筑为难,以至走向衰亡,淮南盐业遂衰。

关键词:淮盐 海岸带 草卤分离 移亭就卤 明清

一、引言

海势东迁,移亭就卤,即12世纪黄河南徙后,苏北海岸带为淤涨状态,盐场随海涂淤进而逐渐外移、东迁的历史过程,是两淮盐业兴衰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①数百年来,“移亭就卤”成为两淮盐作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是适应海势东迁的主要方式与两淮盐作生态的典型特征。

两淮盐业经济史研究堪称丰硕,然多以讨论盐政管理、盐业生产关系、盐法变革以及盐商文化等内容为主,^②涉及苏北海岸带环境变化与淮盐兴衰的研究甚少,^③尚无学者就两淮盐场“移亭就卤”的过程做过专题讨论,缺少从自然环境变化的角度深入检讨淮盐发展过程。盐作活动与环境关系密切,历史上两淮盐业长期为全国盐产重心,在16至19世纪鼎盛发展的数百年来,受到苏北海岸东迁强烈影响,故有必要从自然环境变化与盐业生产的联系出发,检讨淮盐兴衰变迁。其中,“移亭就卤”集中体现了淮盐兴衰与环境变化的密切联系,是厘清明清苏北海岸带环境变化与淮盐兴衰关系的关键,也是盐作生态的突出反映,对检讨旧说、深化淮盐兴衰的认识具有重要

[作者简介] 鲍俊林,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博士后,南京,210093,邮箱:baojunlin@nju.edu.cn。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5M581764)“16—20世纪江苏沿海荡地开发的时空特征及环境适应”;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1402002C)“15世纪以来江苏海岸演化与海岸带管理变迁研究”。在本文修订中,得到两位外审专家悉心指正,谨此致以诚挚感谢!

① 黄公勉、杨金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② 刘庆龙:《近20年清代两淮盐业研究述评》,《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2期;陈锋:《近百年来清代盐政研究述评》,《汉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2期;吴海波、曾凡英:《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版;佐伯富「清代塩政の研究」,東洋史研究会,1956年;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版;渡边悳:「清末における淮南塩場の衰退について」,『立正史学』1972年第36号;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黄公勉、杨金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方明、宗良纲:《论江苏海岸变迁及其对海涂开发的影响》,《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刘森:《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凌申:《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意义。^①

此外,海盐生产也是海岸带海陆相互作用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LOICZ)的研究重心也向人类影响和人地相互作用的海岸带环境变化和综合管理转移。^②因此,明清时期数百年内苏北海岸带环境变迁与盐业兴衰的研究也可以为其提供一个长时段观察背景。

本文尝试结合现代海岸带生态学基本原理与历史文献记载,着重分析明清淮盐“移亭就卤”的基本面貌、变迁过程与特点,以及对两淮盐业兴衰的影响,总结两淮盐业因海势东迁而表现的特殊生产形态,深化两淮盐作活动与环境变化的认识,并从一个侧面论证海势东迁引起的苏北沿海自然环境变化并非清末淮南盐业衰落的主要原因。

二、海势东迁与亭场位移

12世纪以后,黄河南徙夺淮入海,苏北沿海滩地逐渐淤进。进入16世纪,淤涨快速,^③塑造了广袤的海涂滩地,这一重大地理环境变迁对两淮盐作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草丰卤足是两淮煎盐作活动的基本条件,虽各场荡地“每因淤沙外涨,腹内荡地土性渐淡,是以率多改荡为田,垦种杂粮。”^④但“腹外”新淤荡地仍多卤旺,“滨海之新淤尽属斥卤,蓄草之外,不能种植,……宜置亭而不虑其垦种”。^⑤这是由于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存在规律性演替现象,即海岸带生态特征出现有规律的演替序列,板沙滩逐渐向浮泥滩、光滩、盐蒿滩、草滩转变,在自然状态下,承前启后,循序渐进,不可超越或逆转,^⑥保证了宜盐带(新淤荡地)持续存在。旧亭场逐渐土卤淡薄,难以产盐,新淤荡地草卤条件较好,故“海势东趋,多有移亭就卤”。^⑦通过搬迁亭场到近海傍潮的草丰卤足之地,继续煎盐生产,成为两淮盐业生产适应环境变化的主要方式,^⑧也是区别于其他海盐产区的典型特征,自12世纪以来,这种独特的盐作生态,存在了数百年。^⑨

早在南宋时期,便已出现亭场搬迁。宋以前,苏北海岸线长期稳定在范公堤(今通榆公路)一线附近,^⑩煎盐亭场的位置也比较稳定。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增修泰州捍海堰后,经南宋及元代多次延修增筑,障壁海潮,屏蔽盐灶,但堤西土壤海浸频率降低,脱盐加快,亭场逐渐纳潮困难,不适

① 以往淮盐研究缺乏专题讨论盐作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对“移亭就卤”的认识比较薄弱,以至对淮盐兴衰的理解不够全面。如关于清末淮南盐衰的原因,学界仍缺少深入检讨,一般认为海势东迁引起的自然环境变化是其主要原因。但此说不足信,明清两淮盐业兴衰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在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非自然环境。参见鲍俊林《晚清淮南盐衰的历史地理分析》(《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184页)、《再议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与凌申先生商榷》(《盐业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② 朱高儒、许学工:《海岸带海陆交互作用(LOICZ)的新动向和国内研究进展》,中国地理学会编:《中国地理学会百年庆典·学术论文摘要集》,2009年印刷,第4页。

③ 张忍顺:《苏北黄河三角洲及滨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地理学报》1984年第2期。

④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27《场灶一·草荡》,同治九年(1870)扬州书局重刻本。

⑤ [清]丁日昌:《淮鹺摘要》卷1,[清]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3,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3页。其他盐法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客观反映了海岸带生态要素的演替规律。

⑥ 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⑦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42《优恤门》,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按:两淮盐场摊晒草灰制卤的场地称为“亭”、“场”、“亭场”、“灰亭”等;煎熬卤水成盐的灶屋称为“灶”、“舍”,故多将煎盐之地通称为“亭场”、“亭灶”、“盐灶”等。

⑧ 明清时期,淮南盐场面积与产量规模长期占据两淮主要部分,本文重点讨论两淮煎盐法下的“移亭就卤”,故以淮南移筑亭场为主,旁及淮北。淮北盐场自明代中叶改晒后,仍有移铺就卤,主要考虑卤水远近,不再需要兼顾荡草资源,移筑新铺相对简单,规模较小。

⑨ 两淮“移亭就卤”的盐作形态,与明清时期苏北海涂大规模淤进成陆密切相关,其他海盐产区滩地、盐场位置相对稳定。除苏北海岸带外,根据朱广福的研究(《从江口段历代盐场的分布看“海退”的实际情况》,未刊稿),受长江口滩地淤进影响,历史时期长江口附近的盐场也存在类似的“移亭就卤”盐作形态。

⑩ 张忍顺:《苏北黄河三角洲及滨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地理学报》1984年第2期。

宜煎盐生产,故堤西亭灶渐次搬迁至堤东。晚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6),淮南诸盐场堤西基本没有亭灶,据嘉靖《两淮盐法志》诸盐场图,^①泰州、通州以及淮安三司诸盐场,其范公堤以东均绘有煎舍、潮墩等盐作活动标志物,堤西则没有。明末清初,海潮更远,堤西旧亭场纳潮愈加困难。如新洋港口已经到了花川港,距离范公堤约50里,^②堤西亭灶早已无法生产。据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记载:“凡明以前之灶地多在范堤以西,今日农灶,亦曰引田,其地在明之季世已多垦辟”。^③可见,堤西亭灶在明代已经盐改垦,亭灶基本搬迁至堤东。

清代中期,海势东迁速度增快,加上团煎已改为散煎,^④灶户“移亭就卤”更为普遍。自陆向海,弃旧设新,从卤淡老荡移筊(迁移、设置)至新淤卤旺荡地,是明清时期淮南煎盐生产的重要特征。同时,为方便管理,盐课司署也随之东迁。^⑤晚清淮南盐产下降,各场仍基本以移筊亭场为振兴手段,“近来海势东趋,卤气日薄,宜劝各垣商另移卤地筊置”、^⑥“旧时(余西)亭场距海较远,卤气轻淡,是以渐移向外。”^⑦

除淮南诸盐场外,淮北盐场也是如此。自明代中叶改晒,盐场主要依赖卤水远近,不再需要荡草,故海势东迁,仍有移铺就卤。如“中正场……滨海从前晒盐池面多坐落中正、小浦、东大、东辛四疿,道光季年,海势东迁,卤气日淡,于是花垛废而中富兴,盐池悉移铺焉”、^⑧“海远滩高,卤气不升,池面应行移铺。”^⑨但淮北盐场海涂淤涨远小于淮南,移铺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中正场。

广设潮墩与“移亭就卤”密不可分,“潮墩之修废,灶丁之生命系焉。”^⑩潮墩分布是明清时期淮盐适应海势东迁、逐渐扩张规模的重要反映。今盐城市境内的地名,往往与成陆初期盐、渔、农业或者微地貌、河道有密切关系,很有规律性。^⑪直到今日,仍有大量聚落、自然村带有“墩”、“灶”、“团”等字,保留了盐作活动的历史遗迹。^⑫嘉靖年间,淮南各场潮墩共174座,^⑬亭场15599面。^⑭入清后亭灶更加分散,康熙十年(1671)盐城知县陈继美巡视沿海墩台,作诗云:“墩台星罗接大荒,凭高远眺海云翔”,可见清初沿海墩台已相当密集。^⑮至嘉庆年间(1796—1820)淮南各场潮墩逾300座,^⑯亭场为21342面。^⑰淮南盐场迎来鼎盛发展时期,清廷也加大了官办潮墩规模,分布日广,煎盐规模也相应

① 嘉靖《两淮盐法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99—613页。

② 夏祥:《〈历史时期江苏海岸线的变迁〉纠误》,《江苏地方志》1994年第3期。

③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5《赋税·场课》,《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9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

④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4《产殖·场灶》,《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9辑,第410页。

⑤ 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丁溪场盐课司署东移50里至沈灶。乾隆三十一年小海场盐课司署东移50里至小海团,咸丰十一年(1861)草堰场盐课司署东移50里至西团。(盐城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盐城市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76页)

⑥ 丁日昌:《淮鹺摘要》卷1,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218页。

⑦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6《图说门·通属九场》,《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74页。

⑧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8《图说门·海属三场》,《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97页。

⑨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4《场灶门·盐色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343页。

⑩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28《场灶二》。

⑪ 蒋炳兴:《盐城市综述》,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259页。

⑫ 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葛云健:《盐业对江苏城市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第5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110页。按:团、灶、总等为古代淮盐生产组织之名,后来多形成聚落,发展为村、镇,其名多沿用至今,十分普遍。如东台市内的南沈灶、头灶、四灶、北团、东团、西团、南团等。墩是海涂上人工堆起的土墩,主要用来避潮,也叫救命墩,以后形成聚落、村镇,仍以墩命名,例如张家墩、蔡家墩、三墩等。

⑬ 据嘉靖《两淮盐法志》卷3《地理志》各场潮墩数量整理。

⑭ 据刘森《明代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整理。

⑮ 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6页。

⑯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28《场灶二》整理。按:两淮潮墩绝大部分在淮南,嘉庆年间淮北仅有21座潮墩残存。乾隆十一年兴筑潮墩,淮南通泰二司共新建143座,淮北没有新设。光绪初年,对淮南通泰各场共新修潮墩99座,淮北也未兴工。

⑰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0《场灶五》整理。

扩大。潮墩与亭场搬迁整体上保持呼应,潮墩伴随淮南盐业盛衰而兴废,随着盐灶东迁而东迁。^①以苏北沿海中部岸段为例,这些含有“墩”、“团”、“灶”字自然村的空间分布,生动反映了明中期以后淮南部分盐场盐作活动的动态发展面貌,逐卤而进,不断东移。团灶集中且距离范公堤近,基本在嘉靖岸线以西。潮墩、散灶更为分散(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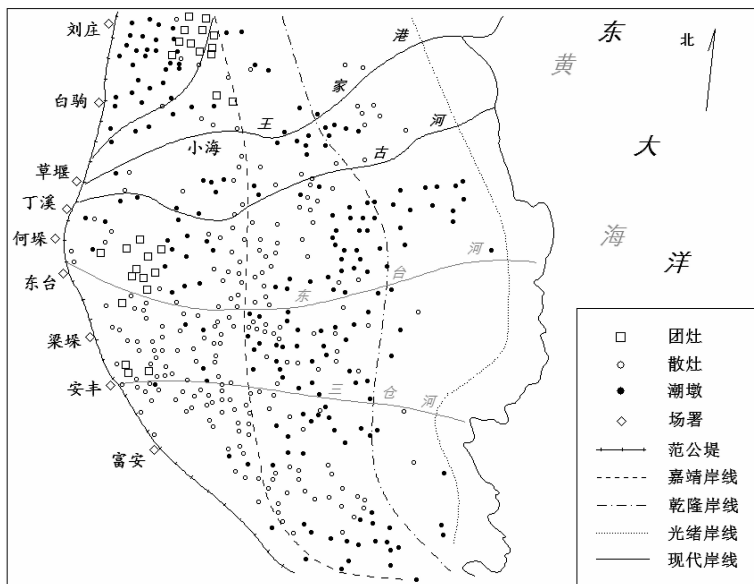


图1 明清时期海岸线变化与亭灶、潮墩分布(苏北沿海中部岸段)

说明:该图利用 MapInfo 软件绘制。底图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CHGIS 清代数据为准;历史时期海岸线参考张忍顺《苏北黄河三角洲及滨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地理学报》1984年第2期);图中“团灶”、“散灶”、“潮墩”的空间分布,以含有“团”、“墩”、“灶”字自然村的分布为据;自然村以建湖、盐城、大丰、东台、海安、南通诸县地名录及地名图为准(1982至1985年间由各县地名委员会编纂)。

三、草卤分离与亭场选址

亭场选址是“移亭就卤”的首要问题。亭场位置受到诸多煎盐生产要素共同制约,并首先取决于草卤条件,很大程度上草卤分布状况决定了亭场的位置与分布特征。康熙《淮南中十场志》梁垛场图中将海滩自陆向海分为三带:草荡、新淤沙荡以及海沙,何垛场图有“陷沙”。^②这种分带与今天江苏淤进型岸段的主要分带(自陆向海为草滩、盐蒿滩、光滩)一致,古今海滩的相似性也使得我们能够根据今天海滩特性去推断古时海滩的特性。^③海岸东迁,受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演替规律的影响,一方面草卤条件具备,另一方面草卤空间分布呈现逐渐分离状态,草滩带主要提供了煎盐生产所用的燃料来源,而卤水资源主要来自光滩带土壤与近海咸潮。并伴随滩地淤进,草、卤逐渐分离,对亭场分布以及盐作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张忍顺认为亭灶一般在草滩带或滨海平原的近海部分,^④盐灶、墩台均建在一般高潮位不能浸漫、秋季大潮均能淹没之处。即平均高潮线与秋季大潮高潮线之间;赵赆等人则认为亭灶设置在草

① 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6页。

② 康熙《淮南中十场志》卷1《图经》,于浩辑:《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第3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另外,康熙《两淮盐法志》卷2《疆域》,载“梁垛场图”,其沿海马路(近海防潮矮堤)两侧,分别绘有草荡、淤荡、光沙,也与现代苏北海涂生态类型分布一致。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02页。

③ 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历史地理》第3辑,第52页。

④ 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历史地理》第3辑,第58页。

滩带与盐蒿滩带,最为理想。^① 这些判断虽基本符合实际,但比较笼统,尚不够准确,也没有区分新亭与旧亭的位置差异及其动态变化。要确定亭场位置以及新亭选址,必须首先严格区分不同荡地类型以及古今指代的差异。现代海滩生态类型分类中,草滩是指生长有多年盐生草甸植物的滩地,是淤进型海涂生态发育最高阶段。^② 故草滩主要指白茅群落。文献中常出现的“草荡”、“沙荡”、“淤荡”,又统称为“荡地”。“草荡”包含了现代分类中年潮淹没带的白茅草滩带与月潮淹没带的盐蒿草滩带,一般泛指白茅草滩以及盐蒿草滩、芦苇草滩等长草荡地,统称为“草荡”;^③“沙荡”主要指植被稀疏的光滩或者光沙不毛之滩地,^④一般多是新近淤涨而成,也是未来蓄草供煎之地。在演替作用下,“草荡”又是“沙荡”、“光沙”的进一步发展。^⑤“淤荡”则为淤涨中的“沙荡”,植被稀疏。另外,依卤旺程度,亭场一般又分为上、中、下三亭,卤气淡薄为下亭,移筮新淤的为上亭或新亭,中间者为中亭。^⑥ 不同的荡地类型,提供了不同的煎盐生产要素,其分布状况与亭场位置以及新亭选址密切相关。

其一,从草卤分布状况来看。海势东迁,草卤分离,由于土壤盐分、植被等生态要素演替存在差异,白茅草滩带、盐蒿草滩带以及光滩,三者所提供的煎盐生产要素并不一致。白茅草滩带土壤已经脱盐淡化,卤水不足,但主要提供了煎盐所必须的大量荡草资源;^⑦盐蒿滩与光滩带土壤呈强积盐态,主要提供了煎盐生产的土卤来源,距离海潮更近,引潮浸渍摊场、晒灰、淋卤更为便利,但产草不旺盛。根据学者对现代海岸带的研究,淤进型海涂年潮淹没带的白茅草滩,不仅剖面平均含盐量较低(2.1‰),而且0至5厘米的表土盐分低于剖面平均盐分,为稳定脱盐环境,有机质厚、盐分低,更适宜种植而非盐作活动。但盐蒿滩土壤含盐量为6‰至8‰,光滩更超过10‰,盐分含量最高,地面有少量植物覆盖,蒸发强烈,是潮间带的主要积盐地带。^⑧其地面光洁,杂草稀少、依潮傍海,正是煎盐所需的卤旺之地,一般成为亭场搬迁的新淤荡地。故新淤荡地对促进盐产具有重要意义,各场一般寻找新淤荡地以便维持盐作生产。如道光二、三年,“伍佑一场本属亭多荡少……得此新淤足供煎办”、“新兴一场原额老荡,地居高阜,以致草稀卤薄……应准商灶于新淤荡内择地报明移煎。”^⑨另外,新淤荡地虽然可以设置新亭,但并非全用于铺设亭场,亭场自身占用土地空间很少,^⑩绝大部分新淤荡地主要用于蓄草供煎。

其二,蒿草密集分布的盐蒿滩一般不便铺设亭场。如《太平寰宇记》载:“若久不爬溜之地,锄去蒿草,益人牛自新耕犁,然后刺取”。^⑪又如富安场“……马路折而东皆光沙不毛之地,三十总灶列沙而居”、^⑫吕四场“新淤丁荡,卤气充足,堪以建亭……该荡在于隄外,逼近海洋,潮汐相应,尽属斥卤,多系

① 赵赉、满志敏、方书生:《苏北沿海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清末民初废灶兴垦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

② 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17页。

③ 历代《两淮盐法志》及盐法相关文献中,“草荡”使用普遍,而极少使用“草滩”。

④ 明清苏北沿海“沙荡”为尚未长草的荡地,或有部分盐蒿草。刘森认为“沙荡”是指“开耕荡地,即嘉靖时升科荡地,与草荡不同”(《明代盐业荡地考》,《明史研究》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96页),此说并不准确,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97《征榷门·灶课》上载:“其滨海各场潮涨水落淤为沙滩,号曰沙荡。”自明代起科,即对新淤沙荡起科认定,交一定的税以便确定“沙荡”使用权归属,避免日后纷争。“沙荡”靠近海潮,潮浸频率高,卤性强,难以种植作物,主要用于蓄草供煎或设置新亭。《续修四库全书》第844册,第571页。

⑤ 盐法文献中“光沙”、“光沙无草”、“光沙不毛之地”是比较笼统的概念,包含了现代分类的光滩、板泥滩以及浮泥滩。

⑥ 丁日昌:《淮漕摘要》卷3,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311页;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29《场灶门·盘鏊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257—258页。

⑦ 淮南煎盐主要使用白草、红草。白草即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l var. major*),红草即盐蒿草(*Suaeda salsa*)。另外,滨海沼泽地的芦苇群落也是煎盐薪材的重要来源。

⑧ 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20、77页。

⑨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97《征榷门·灶课》上,《续修四库全书》第844册,第585页。

⑩ 单个亭场面积约10至30亩。江苏省启东县志编辑委员会:《启东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10页。

⑪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30《淮南道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69页。

⑫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5《图说下》。

不毛,其中间有长草,亦甚茸细,不成片段”。^①可见,土壤盐分高,滩面光洁,杂草少的新淤荡地(稀疏盐蒿滩、光滩)实为理想的铺设新亭之地。故准确言之,不考虑其他因素,新亭场设置在盐蒿草稀疏分布带与光滩之间最为理想,主要在月潮淹没带内。实际上,明清多部《两淮盐法志》所载的盐场图对此均有反映,一般将亭场位置绘制在草荡与海潮之间,靠近新淤荡地。以小海场为例,“小海团”盐灶正位于草荡带与新淤荡地之间,近潮傍海,又有通海潮沟可以利用(见图2)。这正与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演替规律以及滩地类型分异完全一致,也是对微地貌以及海涂成陆过程的适应,对草卤分离状况的客观反映。

最后,从高程看,以苏北沿海中部岸段为例,亭场多密集分布在3至4米左右(以废黄河口零点为基准,下同),该高程以下或以上均为亭场稀疏分布,这与潮滩高程以及潮位有关。据沈永明等学者研究,从东台市典型淤长岸段的潮滩断面测量结果来看,白茅与獐茅组成的茅草群落,其下限高程为3.52米,略高于该区平均高潮位3.5米,属于高潮滩的上部,一年中仅在风暴潮时被淹没,潮浸率非常低;盐蒿群落上限为茅草群落的下限,下限为3.36米,略低于平均高潮位,潮浸率约为20%至30%。^②又据清代《江苏沿海图说》载,通泰沿海朔望月时潮汐一般高度为1丈3尺,约3至4米之间。^③故沿海潮墩、煎盐灶墩均在此高度上下。例如“安丰场旧设潮墩四座,三在马路之西,一在马路之东,每墩计高一丈四尺。”^④光绪初年淮南盐场新建增筑的潮墩一般“高一丈三尺及一丈六尺不等”,^⑤均与平均高潮线基本一致,故近海煎盐亭灶,一般应设置在月高潮也不易淹没的灶墩上,周围有数个晒灰亭场。一般潮墩比灶墩更近海岸,自身高度略高于灶墩。灶墩大致应高于平均高潮线,如光绪年间(1875—1908)修筑灶墩,泰州分司各场灶墩相对地面的高度为8尺至1丈之间。^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淤荡地卤气更旺,但未必一定是最佳设亭选址,距离海岸越近固然越易获取咸潮,如果没有潮墩的保护,亭场冲坏、煎灶溺毁、灶丁淹毙的风险也更大。海势东迁,煎灶日趋分散,避潮墩密度与使用效率降低,在光绪年间大规模兴筑屋墩之前,旧有潮墩长期失修,“海势东趋,新涨沙滩,未设墩座,灶民移亭就卤,旧墩纵有存留等于虚设。光绪七年间飓风大作,海潮奔腾,趋避不及,概付沦胥。”^⑦类似的记载常见史籍,^⑧故海潮侵袭与潮墩的缺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在月潮淹没带迫近海潮之处铺设新亭的冲动与可能,如梁垛场“马路东凡有亭灶,皆系附近潮墩见已修整,如遇大潮之期,尚能躲避,所有近海新淤地方,并无亭灶。”^⑨

总而言之,淤荡上限,草荡下限,亭场多密集分布。草荡内部也有部分旧亭场,多为下亭,远离海潮,卤气浅薄,盐作困难;新淤荡地也有新亭稀疏分布,草卤无缺,多为上亭,但潮灾风险也更大。前临海岸,后依草荡,循引潮河而居是多数亭场的共同特征。自陆向海,这种前有海潮、中有土卤,后有荡草的空间分布格局,长期存在(参见图2)。

①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0《场灶门·亭池》,《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268页。

② 沈永明、曾华等:《江苏典型淤长岸段潮滩盐生植被及其土壤肥力特征》,《生态学报》2005年第1期。

③ [清]朱正元辑:《江苏沿海图说》,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39册,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1—45页。按:此处潮墩高度应为当地相对高度。

④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7《场灶门·堤墩下》。按:该文献中记载的墩台高度为距地面的相对高度,并非海平面高度,没有统一高度零点。

⑤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6《场灶门·堤墩上》,《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365页。

⑥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7《场灶门·堤墩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380—381页。

⑦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6《场灶门·堤墩上》,《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357页。

⑧ 如嘉靖《惟扬志》卷9《盐法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载: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大海潮,漂没灶房2195座,灶舍33373间。嘉庆《东台县志》卷7《祥异》也记载了诸多潮灾,特别是农历七月份的天文大潮,损害尤多。如康熙四年(1665)七月,“飓风作,拔树,海潮高数丈,漂没亭场灶丁男女数万人”;雍正二年(1724)“七月十八、九日,风雨,东台等十场暨通海属九场,共溺死男女四万九千五百五十八口”。(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29—333页)按:史籍记载的潮灾常为年高潮,潮位明显超过潮墩高度,损害尤烈。一般月高潮并不会造成严重伤亡,通泰沿海朔望月时潮汐高度一般为1丈3尺,约3—4米之间,比大部分潮墩高度略低。

⑨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7《场灶门·堤墩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3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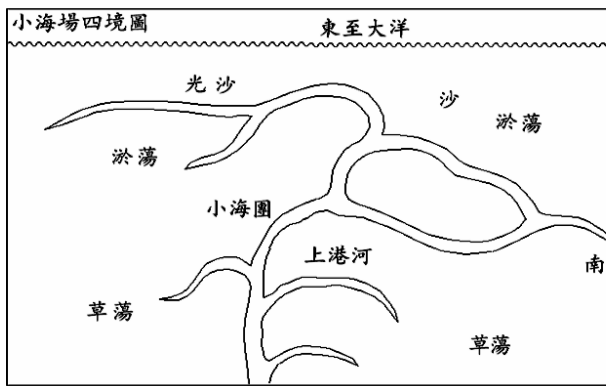


图2 淮南盐场荡地、亭灶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康熙《淮南中十场志》卷1《图经》“小海场四境图”改绘。
《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第33册,第264页。

四、亭场搬迁频率、引潮沟与移筭临界点

整体上看,16至19世纪,两淮盐场亭灶固然因滩地外涨而不断东迁,但实际上,一方面由于自然演替作用缓慢,另一方面引潮沟的普遍使用,故大部分亭场搬迁频率并不高。在长期利用引潮沟逐渐适应海岸东移的过程中,亭场土壤盐含量逐渐降低,修浚引潮沟的投入也不断加大,以至产盐效率下滑,沦为低产区时,才有了搬迁动力。

首先,虽然海涂淤进快速,但海涂生态要素的自然演替却是缓慢的过程,单个亭灶完全有时间适应,无需频频搬迁。不考虑战乱、灾害等其他因素以及引潮沟的作用,仅因海势东迁所致亭灶搬迁最短的时间间隔至少约十几年。因为受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演替规律制约,从不毛光沙到长草新荡(盐蒿草稀疏分布),一般需要15至20年。例如长江口九段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始出露水面,咸丰八年(1858年)开始有植被生长。^①考虑到长江口淡水径流量大,近岸表层海水盐度低于苏北岸段,^②故苏北沿海滩地从光滩到盐蒿滩至少为15至20年以上。如道光十八年(1838)两江总督陶澍奏称“泰州分司所属伍佑、新兴二场前于道光二年新淤升科案内均有剔除光滩、水洼、平路地亩。迄今已阅多年……实丈出长草应升地……”,^③即道光二年丈量时未被计入的不毛光滩,到道光十八年已经长草,丈量升科时计入新淤荡地,其时间间隔为16年;同书又载,同治八年(1869)吕四场新淤丁荡尚未设亭置灶,“该荡在于堤外,逼近海洋,潮汐相应,尽属斥卤,多系不毛,其中间有长草,亦甚茸细……查该荡新淤前于咸丰元年……勘丈……”,^④即丁荡在咸丰元年(1851)后开始逐渐淤积,到同治八年,才有稀疏植被群落,历时18年左右。

在滩涂淤进较多的地区,一般亭场搬迁相对突出,如盐城新兴场北七灶有四移煎之名,^⑤这已经是比较突出的搬迁了。嘉庆年间,东台场“马路之外光沙无草”,^⑥并没有亭场。到光绪年间,东台场沿海马路以东有“北新亭”、“南新亭”,何垛场马路以东也有多个“新亭”,^⑦数十年里才有若干亭场搬迁。这与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演替规律基本一致,那些远离海潮的中亭、下亭完全可以通过引潮沟

① 陈家宽:《上海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② 薛鸿超、谢金赞等:《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专业报告集·中国海岸带水文》,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③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97《征榷门·灶课上》,《续修四库全书》第844册,第588—589页。

④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0《场灶门·亭池》,《续修四库全书》第844册,第268—269页。

⑤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5《赋税·场课》,《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9辑,第418页。

⑥ 嘉庆《东台县志》卷8《疆域》,第344—345页。

⑦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7《图说门·泰属十一场》东台场、何垛场图,《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82、84页。

获取咸潮。

其次,海岸东迁,草卤分离,需要通过人为调节使煎盐生产要素相互结合,故充分利用引潮沟对盐场适应滩地外涨至关重要,降低了亭场搬迁的可能,延长了亭场存在时间,也是盐作活动对荡草、土卤、咸潮以及劳动力资源集约利用的集中体现。淤进型海涂潮滩宽阔,海潮与草滩带存在一定距离,少则数里,多则数十里甚至百里以上。据张忍顺研究,16世纪以后,安丰、东台等岸段淤进快速,每年约数十米到百米以上。^①同治年间(1862—1874)丁日昌实地查勘,安丰场“乾隆中年以来至道光初年,马路以东得古淤七八里,新淤十余里,续淤又十余里,地方广阔,出草既多,兼卤气极厚,又东至海边光沙六七里,人皆以捕鱼为业。”^②可见,新淤荡地相当宽阔。宽阔的淤荡,使得旧亭场远离海潮,潮浸频率降低,只有通过人工引潮方能维持盐作活动。《最近盐场录》载:“(淮南)各场地面有串场河、引潮沟,不独得资蓄泄,亦可藉引碱潮,而运草运盐更为便利。若沟河不通,无从得潮,潮水不至,无从得卤水利。”^③故各场灶河、引潮沟密集而发达,港汊密布,亭场多分布在港汊附近(见图3),依靠各类河道纳潮。

20世纪60年代前,江苏海盐产区都是采用引潮法纳潮。人工纳潮中或用自然港汊,或用人工开浚的引潮河。江苏沿海潮汐在农历上半月以十三日起水,至十八日止,下半月以二十七日为起水至初三止,每汛在这六天为大满,亭场皆被海水浸漫,潮退后的亭场土壤含盐分增加,灶民根据亭场位置,先高处后低处依次摊灰开晒。先晒上场,次晒中场,最后晒下场,每日下午收灰入淋,场地空了,再放海水浸漫,以便次日摊灰曝晒。^④以今天苏北岸段作参考,江苏沿海为正规半日潮,一个太阳日内有两个高潮与低潮。平均涨潮历时3至4小时,平均落潮历时8至9小时。^⑤可见平均高潮线附近自然浸灌的条件比较优越,因此平均高潮线以上、年高潮线以下的亭场多利用潮水上涌充分纳潮,蓄积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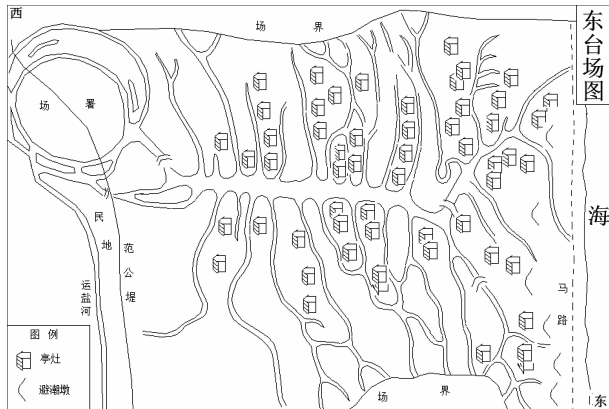


图3 嘉庆《两淮盐法志》东台场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嘉庆《两淮盐法志》东台场图描绘。

再次,官府控制也可能成为影响移筭亭场快慢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为控制盐业生产,防止透私,并不鼓励“移亭就卤”,反而竭力控制灶丁,编订保甲册,设立火伏法,^⑥目的无非是从源头上控制

① 张忍顺:《苏北黄河三角洲及滨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地理学报》1984年第2期。

② 丁日昌:《淮鹺摘要》卷1,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249页。

③ 民国《最近盐场录》,曹天生点校,《近代史资料》第10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④ 沈敏、卢正兴:《两淮制盐技术史话》,《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⑤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盐业志》“1951—1987年江苏沿海各闸潮汐要素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⑥ 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145页;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15—20、35页;[日]佐伯富著,顾南、顾学稼译:《清代盐政之研究》,《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盐业生产,稳定盐课。晚清两淮盐产下滑,移筭亭场逐渐公开化。但光绪初年,为整顿淮南盐场,仍规定调查登记后,亭场10年内禁止移筭,以防止私自设亭,杜绝私盐生产。^①到光绪末年,情势已然不同,也明显超过了15到20年的沙荡自然演替时间,部分亭场不搬迁便难以生产,只能迁就时宜了,如石港场“旧时距海不远,今则海沙涨起数十里,变为沙坦,亭场距海既远,卤气不升,渐移向外,虽违例禁,实就时宜。”^②

最后,亭场远离海岸,土壤盐分降低,河道淤塞、修浚投入增大、引潮艰难,便到了“移亭就卤”的临界点。换言之,当亭场周围盐蒿草逐渐消失,演替为白茅占优势的植被群落时,荡草资源固然更加充裕,然而此时亭场土壤相应处于脱盐状态,不利于制卤。此后主要依赖人工引潮,若引潮沟失修,亭场极易荒废,盐作困苦。^③因此,某种程度上,旧亭场是否搬迁取决于引潮沟的维护与修浚的困难程度。引潮沟随着滩涂淤涨不断延长,其河口处由于海潮周期性淤积泥沙顶托,极易淤塞,疏浚工作繁重,一旦荒废,不能引潮,便影响了盐产效率,因此引潮沟虽能满足纳潮需求,但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资源加以维护,“每为沙泥壅涨淤塞,每岁亦须频频捞洗以深之”、^④“冬令潮枯水涸,责令一律挑修,其通海口门尤宜疏濬,务使潮流四达,卤旺盐丰。”^⑤而且及时维护与修浚的人工投入也相当艰巨,工作异常艰辛,如《熬波图》所形容:“潮来沟水满,潮落三寸泥,十日泥三尺,沟与两岸无高低,长柄杓短柄锹,开深八尺过人头,但得朝朝水满沟,一生甘作泥中鳅。”^⑥

五、清末新亭投入及其影响

“移亭就卤”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的共同影响,但在并不缺少草卤条件的情况下,“移亭就卤”维持与否主要取决于经济投入能力,这又明显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⑦在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时,长期形成的“移亭就卤”生产形态可能遭遇重重困难,抬高煎盐生产成本,制约移筭新亭、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这在清代后期尤为明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淮南盐衰。

同治年间,移筭亭场一般每副约需要银130至250两不等,花费不菲,也高于修复亭场。^⑧官府盐引时常积压,场商资本占搁,此项投入实属不易。又如吕四“场境之北向有荡地,计可置百余面,实为草丰卤足之区,约计新筭一亭,挑塘、筑墩、起建灶屋、买置鑿口,统需成本二百数十千文,现在租商皆系凑集之资,断不能筹此巨款创立新亭,似非另招股商不能集事。”^⑨可见,此时移筭新亭投入成本较大,且移筭新亭也并非一定成功,试煎也要担风险。^⑩另外,草卤分离,既增加旧亭场修浚引潮沟的

①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29《场灶门·盘鑿下》载:“此次清查亭灶,拟刊发简明门牌,随时稽查也……上亭宜以双鑿计额,使无余盐透私;中亭宜以单鑿计额,使其不至受累,查无门牌之处,即系私亭……定案后,十年之内不准再有移筭亭场。”《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258页。

②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6《图说门·通属九场》,《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71页。

③ 如嘉庆《东台县志》卷10《水利》转引《中十场志》:“灶河亭民之命脉也,在困则赖以淋晒,在场则赖以装运,但地系沙土,其性善走,又形势浅狭易致淤垫,逾月不雨,河流立枯,淋晒既艰,装运复苦,驾以牛车劳费数倍”,故定例五年一浚,但“万历中未经挑浚者三十余年,几成平陆”。

④ [元]陈椿:《熬波图》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2页。

⑤ [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30页。

⑥ [元]陈椿:《熬波图》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2册,第327页。

⑦ 鲍俊林:《晚清淮南盐衰的历史地理分析》,《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184页。

⑧ 丁日昌:《淮鹺摘要》卷3,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316页。“掘港场……移筭每副约需三四百千不等,而复建不过需其大半。”同书卷33第1257页载:“约计新筭一亭,挑塘、筑墩、起建灶屋、买置鑿口,统需成本二百数十千文。”同书卷35第1321页又载“询筭每副亭场,约需二百余千。”据彭信威研究(《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5、623页),同治年间约银1两合钱1600至1800文。因此,合计筭置新亭需要银130—250两不等。

⑨ 丁日昌:《淮鹺摘要》卷1,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257页。

⑩ “卤气浓淡未能确有把握,诚恐试煎,无效致贻后累”。见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卷30《场灶门·亭池》,《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第269页。

成本,也增加了新亭场运草、运粮、远盐的成本。新亭虽近咸潮,却远离草荡,附近盐蒿草滩产草又远不如白茅草滩旺盛,^①且白草火旺,红草力小。^②故很多亭场依赖购草为主,而部分引潮困难、难以产盐的旧亭场灶户,干脆转而贩草获利,出现了专门贩卖荡草的草户。^③亭场距离草场也很远,多者二十余里,少者七八里。牛车运输远则三日,少则二日,^④故运粮、运盐、运草都逐渐困难。

移筭亭场需要资金投入,清末煎盐本重利薄,商、灶往往借贷度日,以至铺设新亭的积极性受到明显抑制。很大程度上,咸丰至光绪年间,淮南盐业长期不振,便与移筭乏力有关。同治年间,丁日昌勘察两淮盐场,便深刻体会到虽各场新淤荡地草、卤基本具备,但遭遇无人投入的尴尬。如“三场(掘港、栟茶、丰利)近海下沙之地,其势辽阔,卤最厚,惜无殷商建立亭场。”^⑤可见,荡草、卤气并不存在问题,是否有稳定投入,已成为“移亭就卤”得以维持的关键。至光绪末年,官府仍然希望鼓励灶户移筭亭场,以图恢复煎盐生产,进而稳定盐课。除个别盐场地居腹里,难以产盐外,^⑥与同治年间一样,虽然各场新淤荡地草、卤无缺,但仍因财力匮乏,制约了新亭铺设的积极性。又据《盐法通志》记载,庙湾场“随地皆卤,随地皆可筭置,且闻学滩、苇营两地草荡几数千顷,诚天然丰饶之区”,特别是掘港、何垛、丁溪等场“草多卤足”、“草卤无缺”。^⑦然而“场商资本多不充裕,灶丁困苦已达极点,加之近年以来灶丁则因草贵食昂,受累场商则因本重钱贱暗亏。”而恢复生产,移筭亭灶、匀配草荡、及时疏浚引潮河等措施,都需要筹款投入,“今商灶情形如此,已觉撑柱维艰,若再责以筹备巨费举办各事,势必无此力量。”另外,此时盐商往往不思扩大生产、技术变革,多半坐收利息为主,亭灶荒废,“场商安享其成,不思振作,吝于接济,惮于休整,以至灶情疲玩。”以至查勘两淮盐务的署江宁府知府许星璧无奈总结到,淮南盐业“此乃自海势东迁以后,昔日范公堤一带,潮丰卤足之区,今则距海已遥,亭荒卤淡,场商因循自娱,或因租产而痛痒无关,或系自垣而资本不足,听其荒废,移筭无多。”^⑧因此,无怪乎张謇如此感慨:“试问淮南北各场商,有一人肯为增产而倾资整顿、冒险改良者乎?无有也。”^⑨由此可知,即使有卤旺,然而荡草价昂,煎盐本重利薄,投入日绌,移筭势必乏力。清廷为应付财政危局,迫切希望提振盐课,不顾实际推动增产,也只是徒有增产愿望,故“海势既迁,垦地益辟,荡草之供煎不足,亭场之移筭为难,产额虚增,无补实际。”^⑩

总而言之,“移亭就卤”一直是淮南盐场适应海势东迁的发展方式,晚清以后,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新亭投入日绌,加剧煎盐本重利薄、私垦日多,加上晒盐竞争等,共同决定了“移亭就卤”难以为继、有心无力,“亭场移筭为难”。故晚清至民国初,新亭铺设乏力、旧亭场盐产下滑,正是咸丰军兴以

① 据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编《江苏植物志》(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6—237页),白茅植株高25—80厘米,在今天江苏省中部淤进型岸段仍有大面积分布。白茅群落也是海涂植被演替的最后阶段与顶级群落(刘昉勋、黄致远:《江苏滨海盐土植被的发生与动态的观察》,《植物学报》1980年第1期)。盐蒿(盐地碱蓬)植株高30—100厘米(《江苏植物志》下册,第123—124页)。又据赵大昌《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专业报告集·中国海岸带植被》(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150页),白茅群落覆盖度70%—80%,盐蒿群落覆盖度约60%。

② 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3《制法》载:“淮南之盐利用煎,其煎以草……其草有红有白,皆含咸味,白者力尤厚,红可外售,而白有禁斫。”民国三年(1914)文明书局铅印本。

③ [民国]周庆云:《盐法通志》卷27《物地》载:“庙湾一场,灶户止有一亭,亦未开煎,专以贩草渔利,亭池全属商置”。

④ 张孝若:《张季直九录·实业录》卷3,上海书店影印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6页。

⑤ 丁日昌:《淮漕摘要》卷3,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5,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321页。按:据佐伯富、徐泓等学者研究,晚清淮南盐场灶户贫富分化,亭场商置趋多(参见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62—63页)。故一般灶户无力移筭新亭,这为殷实商人兼并、置新提供了可能。但清末商、灶资金短绌,筭置新亭更为艰难,又制约了商亭进一步扩大。

⑥ 如《盐法通志》卷27《场产三·物地三》载:刘庄场“卤气枯竭,荡多垦熟化为腴田,又无尾沙,难谋移筭,灶丁乐于开垦,苦于办煎。”

⑦ 周庆云:《盐法通志》卷27《场产三·物地三》。

⑧ 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7《场产十三·产数》。

⑨ 张謇:《盐业整顿改良被扼记》,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21页。

⑩ 《清盐法志》卷109《场产门十·产额》,于浩辑:《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第5册,第437页。

来淮南盐产长期短绌的直接原因。在新亭场投入不足、旧亭场产量不断下滑的情况下,淮南盐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长期的“移亭就卤”盐作形态走向衰亡。

六、结语

海势东迁,草卤分离,“移亭就卤”成为两淮煎盐生产对荡草、土卤、咸潮以及劳动力等盐作要素集约利用的客观反映。通过“移亭就卤”、使用引潮河,弥补了要素分离的不足,实现了盐作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动态平衡。淮南盐场长期以来通过“移亭就卤”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海涂外涨的环境变化,并在海势东迁最为显著的16至19世纪内取得了繁盛发展。

“移亭就卤”能否持续,是判断明清苏北海岸变化是否抑制淮盐发展的关键。“移亭就卤”的长期存在,已充分说明了海岸变化并未妨碍淮盐发展,这得益于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存在的演替作用,保证了海岸带的盐作自然条件。因此,淮盐发展程度,主要取决于“移亭就卤”盐作形态能否延续。在草卤条件并不缺乏的情况下,投入的稳定与否便成为影响或制约淮南盐作持续存在的主要因素,这又明显受制于社会经济状况。

清末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盐业经济难以良性循环,虽各场筑置新亭的草卤资源基本具备,但以往运转正常的“移亭就卤”生产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加上淮北晒盐、四川井盐的竞争以及荡地垦务兴起等,加剧了淮南盐业本重利薄,遂逐渐放弃“移亭就卤”。换言之,清末淮南盐衰,实质是长期“移亭就卤”的盐作形态在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背景下难以为继的结果,而非自然环境丧失了“移亭就卤”的盐作条件。

The Research about *Saltworks Migration and Vicissitude of Huai Salter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o Junlin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su coastline silting up rapidly and many saltworks migrated to tidal flat. It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Huai salt industry vicissitude. On the surface, Jiangsu coastline migr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ai salt industry, but It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s by migration saltworks along with salt tide. this unique salt industry production mode last for hundreds of years. Because of coastal zone siltation, It start to gradually separate between grass and salt. S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coct salt production factors affect the way and process of saltworks migration. *saltworks migration along with salt tide* is a process of intensive utilization about grass, salt tide and labor force. It is a process of adaption to changing coastal environment and affect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To a large extent, the deterioration of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 inhibited the enthusiasm of saltworks migr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So this mode can no longer be continued.

Key Words: Huai Salt Industry; Coastal Zone; Separation between Grass and Salt, Saltworks Migration; Salt Ecology

(责任编辑:丰若非)